

城市病暴发,“宜居”越来越远

人民日报报道引学者共鸣:更该看一个城市对弱势群体有多善

人民日报以《大城市能否宜居?》为题关注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文章说,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大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些人甚至开始逃离“北上广”。而最近发生在上海胶州路的公寓大火,更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特大城市注定难以“宜居”吗?快速成长的城市将“烦恼”到何时?该如何治理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其实,除了房价高、交通拥堵、街区发展失衡这些市民们日常就能深切体会的“城市病”外,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污染、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离“宜居”越来越远。

在北京,“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但截至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达到1972万人。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达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估计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涌现数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环境污染也让人头疼。在深圳,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即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城市仍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

长,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

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统一综合体,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导致城市“偏瘫”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严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罗亚蒙主张,国家应当控制特大城市规模恶性膨胀。他说,即便按7亿人居住在城市、人均100平方米标准估算,城市用地也只需要7万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国城市建设规划用地和开发区规划用地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只要盘活现有土地,优化利用,也能满足未来城市化的需要。

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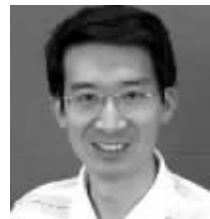
就相关话题,快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周凯教授。他认为,如何对社会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需要认真思索,如果集中放在大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病永远治不好。

边骂边留在大城市的情况并不偶然

现代快报:城市是为“宜居”而建的,但是现在很多城市所谓的“宜居”却需要辨析,甚至需要反思。

周凯:城市一开始的形成,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学家科斯说过,一切都是为了教育成本最低,这才是一个组织或组织架构所存在的经济学意义。现在的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所集聚的是一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而且是两极化,以中心城市为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相关资源全部都被螺旋式等形式“吸”走了。这一过程中,在给政府、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城市带的形成,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回过头来看,这种城市的高度发展最终又会产生异化作用:把诸多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本应享受到的资源都异化掉,比如说,恰恰是因为高速公路、地铁给人们带来了便捷,导致了车流和人流的过量。

现代快报:都在说“北京首堵”,但是大都不肯离去,总觉得留在北



周凯
社会学博士,知名学者

京有面子。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城市的宜居标准?

周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收益和成本之间有考量,由于城市给了他们更多的资源,这种收益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支出的成本,所以他们还是愿意留下来,所以才出现边骂边留的情况,而且越骂越有人留。说到宜居标准,第一,我要有一套宽松的房子;第二,我出去要有相对快捷的交通设施……此外,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也很重要。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那么就能说这个城市是一个相对宜居的城市。

更该看城市对弱势群体有多少善

现代快报:很多人认为,城市的宜居必然涉及到“软环境”。

周凯:一个城市拥有足够多的中产阶层,这也很重要,换句话说,你到一个刚刚才发展起来的县城,和到一个相对有着文化积淀、中产阶层占比比较大的城市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虽然这个县城的硬件设施非常漂亮,但是在和它

相处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不适感。安居才能乐业,问题是,在我们的一些中心城市,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安居,而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种心理的阴影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来说是一柄永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现代快报:有专家说,“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应尽早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凯:我对这个观点不敢苟同,这更是关在大院里念叨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向质量提升转型”,这个“质量”不能仅仅是马路有多少车道,高楼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于有没有一种软的人文环境。我的观点是,一个城市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但更应该是一个具有亲和力的善良的城市。现在很多城市很强大,很强大,但是在这个强大、强壮的背后,是多少的城市居民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更该看这个城市对弱势群体有多少善。

现代快报:现在中国的生态建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与法国以“改造翻新”为重点相比,我们往往是以“平地新建”为重点。

周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肯定会选“万丈高楼平地起”,与对一个旧城进行改造相比,前者所牵扯的利益矛盾要少得多。打造生态城市,是一个美好而艰难的目标。如何对社会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这需要认真思索,如果集中放在大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病永远治不好。
快报记者 刘方志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局长请辞不代表“招考门”真相大白

福建屏南县财政局为疑似领导子女“量身定做”的招聘条件引起热议。财政局局长游代进已于25日上午递交辞职报告,称招聘条件是其一入拟定,并非集体决策,其本意也是为了招聘更优秀的人才,只不过因个人工作失误引起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至于那个被招聘者是否领导子女等关键问题,游代进则并无回应。

(11月25日《中新网》)终于有人出来顶缸。虽然这并不是大家能接受的结果,但总比没结果好得多。不过,还需继续追问,还原事件真相,局长请辞并不代表“招考门”已经真相大白。屏南县财政局导演的“一个

人的招聘”当然不是个案,稍加联想和罗列,就可以找出一串这样的恶例来。令人痛惜的是,这样的恶例,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安然软着陆,很少有在舆论监督之下披乱反正的。正因如此,才暗示和纵容了一批批仿效者。人家能这么干,为什么我们不能?大不了被叫停,换个姿势再来。遗憾的是,连叫停都很少有!

由此可见,在一些地方,权力生态已经板结,掌握公权者,可以肆意妄为。像屏南县这样的手法,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连最起码的惺惺作态都不需要,连暗箱手法都觉得很麻烦。公权如此裸奔,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利益集

团在铁幕后已经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这个同盟,已经习惯了目空一切。这种让人窒息的权力生态,不是政权的土围子又是什么?让人不能不震惊:他们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敢这样?难道在屏南这些地方,真有什么刀枪不入的山大王吗?

还好,还好,舆论监督毕竟还是有点效果的。虽然游代进请辞很可能只是缓兵之计,金蝉脱壳之后的他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新职,但至少,这样荒唐的公权裸奔还是被叫停了。但如果我们仅此止步,那还不能说是舆论的胜利,因为请辞既没有触及这类事件的本质,也没有造成必要的震慑。需

要追问的是:到底是谁主导了针对一个人的招聘?这个岗位是为哪位官员的二代设置的?这样的条件到底是如何通过“集体研究”的?这背后有哪些权力掩护和利益置换?最关键的是,要对哪些人进行问责?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调查清楚,处理到位,局长请辞,也只是一场半吊子的监督。

此类事件之所以此起彼伏,就是因为没有进行有公信力的调查,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严格问责。这才使得有些官员有恃无恐,竞相攀比,置民意于不顾,疯狂裸奔。以此来看屏南的“招考门”,局长请辞当然远远不是句号。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

热点纵论

周立波“公粪门”传递有害的价值观

最近周立波和网友群战,不雅词频现。“嘴仗”源自他的这条微博:“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11月25日《青年报》)

客观地说,这条微博在立意上是没什么大问题的,确实有不少网民把网络当作公厕,随意宣泄自己的非理性情绪,谩骂乃至人身攻击的帖子和跟帖比比皆是。

但问题是,周立波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头,却出现了糟糕的过程——在与网友嘴仗升级时,他没有了幽默机智,而是出口成脏。比如称骂他的那些网友为“贱民”,还说“我吐出来的比您吃下去的都多,您就慢慢吃吧”。这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争执,而是对网友毫不掩饰的人身侮辱,以至围观者都诧异:很难想象这些脏话出自一个明星之口!

也许有人会问:普通网友一到网上都可以率性撒野,明星为什么就不能?是的,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明星都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作为在社会上享受种种好处的公众人物,他们必须谨言慎行,有着比普通网友更高的道德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这也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的应有之义。

很显然,周立波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名利双收使他无视这些常识。周立波的糟糕表现,在损害自己形象的同时,也在向社会传递一个有害的价值观:老子现在是名人了,侮辱你们,你们又能拿我怎样?对此,学者张鸣的评述可谓佐证,“现在是令人膨胀的年代,但凡有点名气,都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受不得半点批评”。

以“腔调”著称的周立波自我膨胀后,就现出这样令人吃惊的原形。如任由他这样膨胀下去,那这个社会也就不需要什么公序良俗了,公众人物也就无所谓道德感了。(修仰峰)

热点纵论

救助法因财力不足搁浅?

“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你必须跑赢CPI”,物价高涨,一些人士呼吁尽快出台社会救助法,以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务来救济那些抗风险能力最低的弱势群体。可最新的消息却令人遗憾:从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已经列入了立法规划,征求意见稿也已推出两年多的社会救助法,被确定“有待进一步研讨”,近期难以出台。原因之一是不知财力能否承受。(11月25日《山东商报》)

国家财力有限,出台时机不成熟……真是这样吗?社会救助法的涵盖面确实比较广泛,牵涉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以及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方面,但正因为它的救济面广,才更凸显了出台的必要性。

当下物价凶猛,如果社会救助法能迅速出台,那么它将发挥的救济效用即为雪中送炭,无疑是最大的。

更何况,财力有限的论调在这里也显得似是而非。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创新高,其增幅超过GDP和平均工资,一批新的税种又在酝酿出台,财力不足?站不住脚吧。如果没有“必须为社会救助花大钱”的思维,财力恐怕任何时候都是“不足”的。

只有在危难关头首先保障了底层民生,才能激发社会成员最大的创造性,才有消费的心情和能力,才能刺激经济,整体经济才可能向好。退一步说,社会救济又不是给每个人发红包,只不过是优先保障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并以明显站不住脚的“财力不足”为借口,那就太让人失望了。(李晓亮)

热点纵论

“游资”不是“临时工”

发改委发文称,游资炒作和不法经营者采取欺瞒、哄抬、囤积等不正当手段操纵相关商品价格,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直接推手。(11月25日《新京报》)

游资,游资,又见游资。在“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猖獗的5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就曾把涨价归为游资炒作。本轮农产品涨价,游资是否真为推手?不知道。然而我们知道,在6个月前,在发改委价格司归咎游资前,统计局称,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天气原因,目前没证据表明有游资进入。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巡视员隋鹏飞也说,游资炒作不是大蒜、绿豆等农产品涨价的主要原因。有了之前的经验,相信大家对于发改委这次提出的“游资炒作论”就会心存怀疑——毕竟,发改委也没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自己的“游资说”。

很想提一下另一个热词——临时工。你看,打人的是临时工,乱收费的是临时工,成为“导火索”的还是临时工。临时工已经成了替罪羊,一个糊弄大家的道具。此时,我就担心游资变成第二个“临时工”,总被拿来堵枪眼。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游资看不见摸不着。政府部门发言不是普通老百姓随口说话,是要有事实和数据支撑的。既然发改委信誓旦旦地认为游资炒高了农产品价格,那就不妨明确地告诉大家游资量有多少,如何谋利。目前的游资中到底有没有6个月前的游资身影?如果有,那它们何以能炒作至今?如果没有,那资本何以这么热衷农产品市场?

说清楚了这些细节,才能打消大家心里的疑问,否则,人们就难免会担心游资只是第二个“临时工”而已。(毛建国)